

能见度

visibilité

法国史

吕一民 主编
张弛 执行主编

政府何威胁走私如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

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

Contraband: Louis Mandri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Underground

【美】迈克尔·卡瓦斯 著

江晟译

能
见
度

visibilité

法国史

吕一民 主编
张弛 执行主编

走私如政府何威胁

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

Contraband: Louis Mandri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Underground

【美】迈克尔·卡瓦斯 著

江 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 / (美) 迈克尔·卡瓦斯 (Michael Kwass) 著. 江晨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Contraband: Louis Mandri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Underground

ISBN 978-7-308-16618-8

I. ①走… II. ①迈… ②江… III. ①走私贸易—经济组织—贸易史—研究—法国—近代 IV. ①F73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8163号

CONTRABAND: Louis Mandri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Underground

By Michael Kwass

Copyright©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year)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

(美) 迈克尔·卡瓦斯 著

江晨 译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虞雪芬

封面设计 城色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78千

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618-8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目录

001	绪 论
020	第一章 欧洲消费的全球化
022	消费革命
029	西风东渐：新世界的烟草
040	东风西渐：印度印花棉布
053	第二章 国王的干涉
054	向消费征税：烟草专卖
067	保护制造业：印花棉布禁令
072	一个全球地下组织
087	第三章 一名走私者的成功
090	一名失败的商人
096	一个犯罪学徒
101	萨伏伊：狂野的东部

108	第四章 地下经济
109	运载之物
112	走私之人
125	团伙
133	零售市场
144	第五章 叛乱的叛乱者
144	叛乱的形式
152	破碎的专卖制度
156	匪帮的道德经济学
167	瞄准总包税人
173	第六章 胜利
175	布雷斯地区的布尔格
182	沙尔利厄弧圈
190	沃莱地区的勒皮
193	时代的传奇
204	第七章 自命的将军
204	走私战争
228	马德林的最后一役
236	盖南
243	报纸上的英雄与恶棍
248	第八章 被捕
248	边境上的僵局
253	刺杀拉莫特
257	绑架马德林

273	第九章 处死路易·马德林
274	改良的司法体系
297	处决马德林
318	第十章 印刷品中的马德林
320	王室的故事版本
324	恶魔马德林
332	英雄马德林
348	矛盾的形象
359	第十一章 启蒙运动中的走私活动
362	政治经济学家
378	法官与律师
384	刑法改革
391	马勒泽布
402	第十二章 革命
405	革命的不满
411	拆除城墙
425	重构叛乱活动
429	新的财政体系
441	充满争议的利维坦
447	结语
460	缩略词
463	致谢
465	译后记

绪 论

一名被派驻到偏远边境市镇的高级海关官员同意去会见一个跨越边界而来的走私商人。这名走私者是无数从穷乡僻壤携带一种非法精神刺激类药物进入这个半球最富庶也最强大国家的男女老少中的一员，他已经通过第三方暗示自己做好了达成协议的准备：为了获得新的生活和良心上的安宁，他将出卖其头目——一个警方已经追踪数月的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首领。急于将这名匪首投入重罪监狱的海关官员对同僚的警告置之不顾，他同意黄昏时分在一条作为两国蜿蜒边界的河流岸边见面。当这位官员在约定的时间穿过散落着紫罗兰花的草场前往河边时，枪声想起了。一发子弹穿透了他的前臂。另一发子弹擦破了他的大腿。第三发子弹从右臀以上的位置钻入了体内，撕裂了他的腹部。这名流血不止的受伤官员被匆忙送至一个邻近的军事哨点，但却于事无补。他在随后降临的夜幕中死去，成了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走私战争中的又一名受害者。谣言风传，这次致命事件的伏击者正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匪首本人——路易·马德林。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而又熟悉的故事。海关官员着手调查向富庶国家客户提供毒品的跨国集团；警察与武装商贩在边界地区发生暴力冲突；枪击与杀戮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以至于当局毫不犹豫地将冲突称为战争。尽管知识分子谴责这种暴力，呼吁将走私活动合法化，但法院仍继续将小商贩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的监狱。一直以来，受到客户强劲需求的推动，非法毒

品仍然来势汹涌。

这种边境杀戮并非发生于如今的埃尔帕索、华雷斯或蒂华纳，而是18世纪中叶的勒蓬德博瓦桑，此地是通往法国东南部的繁忙入口。事实上，当我们停下来思考促成这起冷血暗杀发生的奇怪历史环境时，许多最初看起来熟悉的场景却变得陌生了。这位名为皮埃尔·罗贝尔·勒鲁·德·拉莫特的海关官员不是公职人员。他为一家被称为“包税公司”的私人公司工作，这家公司订立了为法国国王征税的契约。事发河流也不是格兰德河，而是将强大的法兰西王国与位于阿尔卑斯山另一侧、萨丁尼亚国王松散统治下的多山的萨伏伊地区分开的基尔河。安排这次会面的走私者（可能也是伏击者之一）是22岁的路易·雅里耶，绰号“皮埃蒙特人”的他是以萨伏伊为立足点并为马德林匪帮服务的众多商贩中的一员。最为奇怪的是，马德林及其团伙所走私的货物——这也是拉莫特的死亡导火索——不是大麻、可卡因或海洛因，而是一种来自美洲的新式毒品——烟草。

包税公司与走私者之间的战争所包含的这一暴力片段几乎很难与历史学家们所谓的18世纪“消费革命”贴合在一起。在工业革命的工厂建立起之前，欧洲的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劳动阶层的成员，都通过一场史无前例的购买热潮摆脱了物资缺乏的困扰。1650年至1800年，他们往自己家中添置了床、梳妆台、镜子和陶器；他们加宽了自己的衣柜，以装下白色的亚麻衣物与鲜艳的棉质衣物；他们还配备了诸如扇子、雨伞和怀表等新的随身物品；他们还饮用充满异域风情并加入大量白糖的热饮（茶、咖啡和巧克力）；此外，他们还通过抽烟、咀嚼烟草和吸鼻烟的方式消费了巨量的烟草。他们的先辈会对此感到惊讶。在新产品、市场革新、更短的流行周期和全球贸易急剧扩张的推动下，近代消费模式得以

成形。^①

虽然历史学家们很早之前就曾指出，欧洲消费的崛起部分取决于新世界对奴隶的压榨和亚洲武装贸易的推行，但他们很晚才开始检视伴随本土贸易而产生的暴力、高压政治与骚乱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这里的商人是在十分平稳的环境中完成交易，消费者们愉快地购买商品。然而在法国，包税公司官员和走私者们所释放出的暴力、刑事司法系统对地下经济的残酷打击以及就打击非法贸易问题所引发的激烈公共争议都反映了18世纪商业与消费领域更为黑暗的图景。帝国、全球化及其催生的消费革命可能已经对欧洲本土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产生了更为剧烈的影响。

对于近代西方世界起源这个更宏大的故事而言，我们如何理解消费革命是至关重要的。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当历史的潮流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从传统转向变革时，这个故事也开启了18世纪的进程。尽管近代西方的文化起源长久以来被锁定于启蒙运动（1680年至1800年）——在这场重大的智识运动中，像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试图战胜迷信，将个体从过去的压迫

^①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IN, 1982);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1993). 关于法国的情况，见Daniel Roche, *A History of Everyday Things: The Birth of Consumption in France, 1600-1800*, trans. Brian Pearce (Cambridge, 2000); Annik Pardailhé-Galabrun, *The Birth of Intimacy: Privacy and Domestic Life in Early Modern Paris*, trans. Jocelyn Phelps (Cambridge, 1991); and Cissie Farichilds,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Populuxe Good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i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228-248. 关于对这一论题的挑战，见John Brewer, “The Error of Our Ways: Historians and the Birth of Consumer Society,” Cultures of Consumption Workshop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Board) working paper no. 12 (June 2004), 1-19; 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16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2008); and Frank Trentmann, “Introduc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nsumption*, ed. Frank Trentmann (Oxford, 2012), 1-19。“消费革命”一词夸大了它所涉及的发展进程的速度和社会深度。因此我对它的应用附带以下几条限制性条款：（1）人口的大幅减少并不一定会引发消费水平的显著降低，即便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尤其是部分劳动阶层成员确实在削减他们的消费；（2）转变更多表现为时间跨度为数十年的演进，而非革命；（3）消费与时尚的增长并非为欧洲所独有。我将在绪论与第一章中详细探讨法国消费革命的社会局限问题。

约束中解放出来，但它的政治根源却经常被追溯至法国大革命（1789年至1799年）。在这一转折性事件中，一个国家的民众推翻了专制政权，基于普世的民主原则建立了新的秩序。虽然当代历史学家们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宏大叙事产生了应有的怀疑，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18世纪是现代性的通路。如果说当代历史学家们无法仅仅通过大哲学家的思想或著名革命领袖的行动寻获现代性的起源，那也是因为他们已经转向了新的社会与文化实践，这些实践在消费高涨的温室环境中大为盛行。日渐扩张的货物流通与逐渐增加的如咖啡店、餐馆、沙龙、书店、剧院、公园等公共消费场所促进了僵硬社会等级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拥有批判思想的公民活动公共场域，催生了近代对于自身与社会的认识。^①对于这一领域的开拓性研究者丹尼尔·罗什而言，消费在法国的出现是更大规模文化转型的关键，停滞经济的传统价值借此让位于近代商品文化的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

在讨论消费模式的近代化影响是否具备建设性时，罗什和其他学者将矛头对准了一种值得尊敬的智识传统，这一传统从消费革命出现之日起即将近代人政治敏感性的丧失归咎于日益扩张的消费模式。“人们通过商品认识自己，”20世纪最为尖锐的资本主义批判者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如此说道，“他们在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住宅、厨房设备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这种将个体与社会捆绑在一起的机制已经发生改变，而社会控制则有赖于它所产生的新需求。”^②马尔库塞警告称，近代消费社会的物质主义妨碍了批判思想的产生，阻止了人类发挥其全部的社会与政治

① 这一论点的主旨出现于近期的一系列调查中：Roy Porter,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 (New York, 2000); John Brewer,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1997); Daniel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1998); and Colin Jones and Dror Wahrman, eds., *The 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s: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820* (Berkeley, CA, 2002).

②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2002), 11.

潜能。罗什明确地对这一批评意见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尽管存在根深蒂固的智识传统，商品并不会必然地推动异化的过程；事实上，它们基本上意味着解放……消费扩张的影响不是全然消极的”。18世纪潮流令人炫目的循环削弱了传统对社会的杠杆作用，推动了“一种新的思想形态，它更具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在任何情况下都更显平等与自由”^①。

将消费革命插入近代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是一项有价值的尝试，但也面临着朝唯物论者的方向重构古老的目的论（也有人称之为辉格党式的）时代阐释体系的风险。毫无疑问，18世纪的思想家和时尚开创者们——从哲学家、经济学家到奢侈品工匠、时装零售商——都在称颂急速成长的贸易与消费所带来的开化和解放。但我们应该借由他们的言辞进行阐释吗，望文生义地采纳他们对于正在其周边发生的商业变革的解释是否就不存在危险了？我不强调返回马尔库塞无视消费者自身所想、主张所有过剩消费行为本质上都属于异化范畴的立场。各色人等都从消费中获得了重大的意义，但如果我们准备理解消费文化的历史发展，那么这些意义（解放抑或其他）必须得到认真对待。然而，为了发展这一领域，为了在历史中定位“消费”，我们必须做的远不止简单地证明贸易的崛起，计算货物的增长数量，向时尚开创者们请教它的所有文化意义。我们必须将“消费”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性政治与社会背景之下——此类背景能够解释为何走私者要在法国和萨伏伊边境枪杀海关官员。

^①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550; and idem, “Apparences révolutionnaires ou révolution des apparences”, in *Modes & Révolutions*, 1780-1804 (Paris, 1989), 111.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CA, 1984)一书促使历史学家们将消费视作一种具有意义的创造性行为，因此关于创造新消费者的的研究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显得十分重要。见Michael Kwass, “Big Hair: A Wig History of Consump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HR* 111 (June 2006), 631-659以及其中所引著作。

全球性视野是研究法国历史的迫切需要。^①如果说法国历史学家们在将更大范围的世界纳入这个国家的历史方面显得十分迟钝，那么研究法国消费的学者更是对是否要冒险进入这个混乱的全球生产与贸易的世界感到犹豫不决。自相矛盾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记录法国物质生活的档案极其丰富。法国档案中充塞着大量的死后清单和遗嘱记录，其中详细罗列了一个人在其去世之时拥有的所有动产。如果不对此类珍贵的档案进行彻底的调查，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18世纪法国堪比于英国的消费增长幅度。遗嘱清单令法国的消费状况开始得到重视。^②可是他们对档案中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生动细节却不甚确定，这不仅是因为那个时常被提及的原因——即较富裕家庭比贫穷家庭更容易陷入困境，也因为此类档案提供了一幅受到严格限定的货物世界快照。清单对于货物的来源、生产者以及在抵达消费者手中之前的流通渠道所示甚少。它们所描绘的物质文化图景未能捕捉到这个喧嚣且时常变得狂暴的生产与贸易世界，而正是这个世界，首先将商品带入了市场。

同时，法国消费革命的史料编撰未能充分地利用18世纪的政治活动。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数十年间，法国遭到了食品骚乱、赋税叛乱、工场纠纷、宗教论战、宪政斗争和喧嚣的公共争议的侵扰。商品的增多与大革命

① 关于近期修正这一问题的呼吁，见Lynn Hunt，“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Context,”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eds.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New York, 2010), 20-36.

② 在丹尼尔·罗什的《巴黎的民众：论18世纪的大众文化》(*Peuple de Paris: essai sur la culture populaire au XVIII siècle* (Paris, 1981)) 的开拓性研究推动下，若干名巴黎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利用死后清单：Pardailhé-Galabrun, *Birth of Intimacy*; Cissie Fairchilds,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nd Roche, *The Culture of Clothing: Dress and Fashion in the Ancien Régime*, trans. Jean Birrell (Cambridge, 1994). 巧妙利用这些材料的外省研究见Michel Figeac, *La douceur des Lumières: Noblesse et art de vivre en Guyenne au XVIII siècle* (Bordeaux, 2001). 另有两部著作通过对清单技巧性十足的研究，详细描述了匠人的物质生活，见Steven Laurance Kaplan, *The Bakers of Paris and the Bread Question, 1770-1775* (Durham, NC, 1996); and Clare Haru Crowston, *Fabricating Women: The Seamstresses of Old Regime France, 1675-1791* (Durham, NC, 2001).

之前的这种冲突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令人吃惊的是，这个问题甚少被人提及。^①一条明晰的线索似乎已经被占据主导地位的两大学术传统所掩盖。看重社会史、将经济与社会的长时段延续性置于短时段政治事件之上的年鉴学派不鼓励历史学家探究消费文化与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正如历史学大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观察到的，该学派与基于事件的传统历史的割裂造成了“重经济与社会史，轻政治史”的结果。^②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学术成就对此也无多少助益。马克思主义者一度主张大革命是充满活力的，它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所鼓舞的资产阶级在1789年夺取了政治权力，这是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杰作。修正主义者及其承袭者们则回应称：18世纪并不存在紧密结合的资产阶级，商业资本主义也未获得充分发展，不足以成为革命性变革的主导者，大革命事实上是新的政治话语、仪式与观念的产物。^③革命政治文化的转向导致了一大批著作的出现，但与日俱增的忧虑认为钟摆已经过于远离资本主义的问题和物质生活的日常体验。基础的经济问题已被推到一旁，导致“经济史从文化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这必然对双方都造成了伤害”^④。现在是时候翻

^① 为数不多提及这一问题的学者包括Colin Jones,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vified: 1789 and Social Change,” in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Colin Lucas (Oxford, 1991), 69–118; William H. Sewell Jr., “The Empire of Fash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P* 206 (2010), 118; and Paul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Cambridge, MA, 2010). 就美国而言，见T. H.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2004).

^②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ESC* 13 (1958), 729.

^③ 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见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98), part I. 关于政治文化的转向，见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1981);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 1984); and Keith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90).

^④ Sewell, “Empire of Fashion,” 118. 另见Jones,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vified”; and Suzanne Desan, “What’s after Political Culture? Recent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3 (Winter 2000), 163–196.

转这一破碎化的进程；再次将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与文化史加以统合；并反思旧制度陷于崩溃的原因。

社会史也必须进行更为彻底的统合。强调日渐改善的物质条件（以及它们所引发的意识的近代形式）的消费革命乐观观点显然与社会史学家的发现相悖，后者强调了这个世纪持续不断的贫穷、工资增长停滞、长期失业状况、土地破碎化、绝望的移民和日渐猖獗的犯罪。大多数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城市的穷街陋巷中或小块的土地上竭力维持着生活。我们应该如何调和这两幅同一时期、均立足于可靠证据的图景？我们如何解释普通人消费越来越多商品的喜悦场景与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工匠行走在路上的凄凉画面？任何关于消费的分析都必须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18世纪的法国目睹了“社会进步与退步的共同加速”^①。

本书无意于解决所有这些方法论方面和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但通过研究18世纪法国的地下经济，它展示了三股强大的历史力量——全球化、消费和国家组织以及这三者如何共同动摇旧制度并推动革命的爆发。因此，本书不仅是简单地将消费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当中，它还阐明了过去往往被孤立考虑的全球、国家与地区转型之间的联系。

近代早期的全球化是这个故事的关键组成部分。^② 通俗而言，“全球

① Jack A. Goldstone,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visited,” in *From Deficit to Deluge: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s. Thomas E. Kaiser and Dale K. Van Kley (Stanford, CA, 2011), 67-103 (引文在第91页)。悲观性的解释另见William Beik,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France* (Cambridge, 2009), 345-347. De Vries, *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第三章为高涨的消费与下行的工资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家庭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大工作强度来增加他们的购买力。但显然，部分家庭即便更为辛劳，也仅能勉强维持而非增加他们的消费。

② 我更倾向于使用中性化词汇“近代早期的全球化”，而非其他的描述——如“最初的全球化”(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2002])、“第一次全球化”(Geoffrey C. Gunn,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London, 2003])或“原始的全球化”(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化”涉及两个经常被错误混淆在一起但却截然不同的现象：新自由主义与世界市场的统合。自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正如日中天。苏联解体，西方的货币政策转向抗通胀而非失业问题，诸如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解除了对工业与金融业的管制，同时对劳工权力进行了限制。^①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紧张状态下，紧缩政策也压倒了凯恩斯主义，并且盛行一时。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的统合也给人以国家正深陷衰退的印象。我们可以想象金钱、货物、人员和信息正以光速穿越边界，而远近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在与日俱增。事实上，单一世界经济的愿景已经充斥各处，以至于如今它成了激烈论战的目标：保守派惧怕它造成的文化混乱，新自由主义者颂扬它的开放市场，左翼担心它对福利国家的侵蚀效果。

然而，尽管在21世纪之交存在全球贸易的浪潮是无可否认的，但新自由主义关于和平、繁荣与权力流散的梦想却并未得以实现。人群之间的壁垒继续高耸；事关货币、市场和自然资源的战火仍在延烧；战争频发，由此增加的公共债务令局势动荡不安；海盗扰乱着公海的航运活动；各国继续用强有力的威权主义方式处理内政和国际事务。^②最令人震惊的是，世界贸易的崛起已经宣告一波史无前例的全球犯罪浪潮的到来，这波全球犯罪浪潮又引发了严苛但程度不一的国家镇压。由于金融与商品市场的自由化，非法武器、毒品、金钱、假冒商品和知识产权跨国界的流动暴增。20世纪末，世界“犯罪生产总值”逼近了1万亿美元的高点，约占全

^①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2005).

^② Paul Ganster and David E. Lorey, eds., *Borders and Border Politic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anham, MD, 2005); Vera Pavlakovich-Kochi, Barbara J. Morehouse, and Doris Wastl-Walter, eds., *Challenged Borderlands: Transcend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Burlington, VT, 2004); and Anatole Kaletsky, *Capitalism 4.0: The Birth of a New Economy in the Aftermath of Crisis* (New York, 2010). 有助于理解全球化的评论见Frederick Cooper, “What Is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Good for? An African Historian’s Perspective,” *African Affaires* 100 (2001), 189–213; and Chloé Maurel, “La World/Global History: questions et débats,” *Vingtième Siècle* 104 (Oct.–Dec. 2009), 153–166.

球贸易总额的15%~20%。^①此外，在毒品这个全球市场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商品上，狂热的消费者需求、繁荣的非法市场与异常严厉的打击活动已经共同造成美国罕见的高监禁率。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发动的“毒品战争”目前导致每年有170万人遭逮捕，25万人遭监禁，将这个国家的监禁率推至世界最高水平。在230万遭监禁的美国公民中，有50万人是瘾君子。因毒品犯罪而入狱的非裔美国人数量高得异乎寻常，以至于被与臭名昭著的非正义法律——吉姆·克劳法相比较。与此同时，在美国边境以南，前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隆宣布与贩毒联盟开战，这导致了6万人死亡（数据仍在统计中），令人惊愕。警方深陷腐败泥淖；军事镇压也招致了侵犯人权的控诉。但涌入美国的毒品仍然未见减少。^②

当代的全球化未能战胜战争、边境冲突、犯罪和镇压活动，这一事实令众多观察者感到困惑，但对于任何熟悉近代早期世界的人而言，应该并不奇怪。在17世纪与18世纪，当亚洲、非洲、欧洲与美洲之间迅速增长的海洋贸易联系创造出世界范围的贸易圈时，政府绝非秉持自由主义的政策，贸易也并不自由。事实上，近代早期世界贸易的增长与强大的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崛起紧密结合，这类国家能够通过足够大规模的征税和

① 全球地下经济的规模非常难以估计。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耐德和罗伯特·诺伊维尔特的著作《窃国：全球范围内非正规经济的崛起》[The *Stealth of Nations: The Global Ris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New York, 2001), 27]估计，全球灰色经济的价值——包括广泛存在的非正式劳工——“接近10万亿”。排除了非正式劳工的保守估计见Willem van Schendel and Itty Abraham, *Illicit Flows and Criminal Things: States, Borders, and the Other Side of Globalization* (Bloomington, IN, 2005), xv; and Raymond Baker and Eva Joly, “*Illicit Money: Can It Be Stoppe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3, 2009), 61-63.

② Moisés Naím, *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2005), 68; “For Lesser Crimes, Rethinking Life behind Ba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12; and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York, 2010). 美国可能正处于毒品战争的转折点上，因为其若干州最近已经允许了大麻的种植、销售和持有。

借贷参与近代的全球战争。当相互竞争的欧洲统治者们展开军事、外交和经济霸权的争夺时，他们便介入了快速崛起的全球经济，以便能够获得并控制横跨大陆的商品流。将其王朝和国家的竞争者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之后，他们建造了强大的海军；授予海外贸易公司（今日跨国公司的先驱）特许状；建立了海外殖民地，并为之争斗不休；资助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新世界的种植园综合体；设置了各种形式的禁令、专卖制度、关税和航海条例；积累了巨量的公共债务；并对任何流动的东西征税。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贸易体系”中拒绝接受而令人张皇失措的国家政策大杂烩。但与斯密所声称的重商主义不如自由贸易有效的观点相反，近期的研究表明侵略性的和开拓性的帝国政策为欧洲本土居民带来了大量的财富。^①

本书将还原这一时期全球化的原貌，即一个永远带有欧洲国家猛烈并时常暴虐干预烙印的经济体系。但本书不止于提供对该体系的概述，还探讨了后者所导致的一种甚少得到研究但却极具重要性的后果：非法市场的惊人发展。通过丈量地下经济的深度，接下来的章节将讲述关于全球化阴

① 关于英国的情况，见Patrick K. O’ Brien, “Inseparable Connections: Trade, Economy, Fiscal State, and the Expansion of Empire, 1688-1815,”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2: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P. J. Marshall (Oxford, 1998), 53-78; and Nuala Zahedieh, “Economy,” in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 ed. David Armitage and Michael J. Braddick (London, 2002). 关于大陆与全球视野，见François Crouzet, *La guerre économique franco-angl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2008); Guillaume Daudin, *Commerce et prospérité: La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2005);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2000); Ronald Findlay and Kevin H. O’ Rourke, *Power and Plenty: Trade, 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Princeton, NJ, 2007), chapter 5; and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2010), chapter 6. 关于经济竞争的思想史，见Sophus A. Reinert, *Translating Empire: Emul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 2011); Istvan Hont, *The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2005); and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